

文化 遗产 研究

集刊 7

复旦大学博物馆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编

文化 遗产 研究

集刊 7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复 旦 大 学 博 物 馆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遗产研究集刊.7/复旦大学博物馆,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8
ISBN 978-7-309-11501-7

I. 文… II. ①复…②复… III. ①博物馆学-丛刊②考古学-丛刊
IV. ①G260-55②K8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1484 号

文化遗产研究集刊.7

复旦大学博物馆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编
责任编辑/方尚岑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字数 332 千
201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501-7/G·1479
定价: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委会

主 编：陈 淳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荣 吕 静 朱顺龙 刘朝晖

杨志刚 沃兴华 杜晓帆 陆建松

陈 刚 陈红京 陈 淳 郑 奕

高蒙河 蔡达峰

编辑助理：俞 蕙 阳 昕 杨 青

目 录

· 思想与方法 ·

谈考古研究的问题意识与阐释

——《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中文第二版

读后感····· 陈 淳 1

· 艺术史与文物学 ·

论晋人尚势····· 沃兴华 17

战国秦汉时期的书写工具

——以出土文物为中心····· 白 晨 吕 静 31

从蔡襄《茶录》看宋代茶事 ····· 赵 琳 57

唐“乌衔绶”小考 ····· 杨小语 76

南宋龙泉窑兴起初步研究····· 黄家豪 87

战国至汉代的席镇····· 杨 茜 110

· 博物馆研究 ·

试论博物馆与中小学教育有效衔接的制度设计····· 陆建松 124

规划博物馆内教育活动空间的理念与要义····· 郑 奕 134

复旦大学博物馆藏台湾地区原住民文物来源探讨····· 刘守柔 156

试论建立我国博物馆经营绩效评估体系·····	厉樱姿	169
------------------------	-----	-----

· 探索与发现 ·

先秦石范考略·····	高蒙河	王 沛	181
广东仁化重桶纸的制作技艺调查·····	陈 刚		190
夏商原始瓷略论·····	郑建明	林 毅	199
考古现场教育活动的展开与反思			
——以上海广富林遗址为例·····	麻赛萍	顾黎敏	216
精读王国维先生《流沙坠简》			
(下) ·····	陈明辉	厉樱姿	曹 媛
229			
天马曲村西周墓葬的性别考古学研究·····	郭璐莎		274
考古发掘品上的写号问题·····	郑 好		298

· 遗产论坛 ·

文化线路视野中梅关古道遗产价值的阐释·····	王 薇	307
变迁中的民俗		
——从吴江小满戏看“非遗”整体性的重要		
意义·····	阳 昕	320
土墩墓的保护与公众阐释		
——以句容地区为例·····	司红伟 王书敏	335

· 科技与保护 ·

内蒙古巴林右旗博物馆藏猫眼效应宝石的无损			
分析·····	王 荣	苏布德	347
中国武术博物馆藏虎头帽武士俑的研究与修复·····	俞 蕙		356

青铜文物缓蚀处理的规范化程序初探

..... 李一凡 杨植震 俞 蕙 裔传臻 366

· 域外采英 ·

哈佛大学“博物馆课程”与美国博物馆专业之形成(节选)

..... [美] 萨利·安妮·邓肯(Sally Anne Duncan) 著

朱 懿 译 380

· 国际交流 ·

“交流与沟通”中日学术互访汇报序言 吕 静 395

龙泉青瓷与高丽青瓷对比浅析..... 董千里 397

中日祭祀活动比较研究

——以海南公庙和爱媛县神社为例..... 尚广超 402

白鹤美术馆藏蝉纹金饰初探..... 杨小语 407

图版..... 412

谈考古研究的问题意识与阐释

——《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
中文第二版读后感*

陈 淳

一、前 言

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2012年第六版的中文译稿终于在2013年年底脱稿。第六版是修订最大的一版，做了一番最彻底的更新和重组，增加了许多新内容，特别是框式专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的最大特点就是以问题来安排章节，并专设一章来讨论考古学的阐释问题。该书开宗明义就提到：考古学关注过去人类的全方位经验，而当今有许多重大问题使我们不能释怀。我们想了解人类最初是起源于非洲，并仅在非洲吗？世界各地从狩猎采集向农业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为何它仅发生在几千年的过程中？我们如何解释城市和国家明显在世界不同地区的独

* 复旦大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外国考古学研究译丛》，项目编号：12&ZD152。

立起源?个人和群体的认同是如何形成的?伦福儒和巴恩将其视为一般性问题,而在这些一般性问题的后面,是较为具体的问题。人们是如何将自己组成社会群体,并如何开拓他们周围环境的;他们吃什么、做什么和想什么;他们如何进行交流及社会为何变迁。

一方面,考古学的目的是了解人类的过去,因此它既是一门人文学科,又是一门历史学科。另一方面,考古学发现的东西本身不会直接吐露真言,需要今天的考古学家来破解这些东西的含义。在这一点上,考古学实践颇像是科学家所为,收集材料(证据),进行实验,提出假设(说明材料的一种预判),寻找更多的材料来检验假设,然后构建一种模式做出解释。因此,考古学不但属于人文学科,而且也是一门科学。它兼有当代历史学家和当代科学家的独创性。

既然考古学是一门科学,那么其研究应该具备科学研究的哪些特点呢?

首先,科学是一种探究问题的方式,它是由寻求可靠答案的人们所建立的一套探索问题的规则和方式。

其次,科学是这样一件事,它是要弄清我们所知某些事情之间的关系。

再次,科学探究必须具备几个要素,这就是概念、变量、假设和衡量。概念是指用准确的名称来称呼一样东西,这是理解的第一步,它使得我们的思考能把握真相。我们思考问题就是通过概念的联系而发挥作用的。变量是指影响某特定状况的因素。分析变量有两个步骤:一是量化;二是衡量。量化过程意指确定一件事标准的量,并给它一个标签。量化的重要性在于,当它能够做到,就能增加衡量的精确性。处理变量意味着将变量安排成一种式样,以便能做某种衡量。假设是提出两个与更多变量之间的关系。^①比如,在农业起源研究中,生态环境和人口密度是两个重要变量,如用土地载能作为生态环境的变量,人口密度作为另一变量,那么如果我们假设农业起源是人口压力造成的对土地和资源的强化利用,那么衡量上述两个变量而得出的结果,就能检验人口压力假设的合理性。

与其他学科相同,考古学也有两种探究的视角:一是一般性视角;二是特殊性视角,这两种视角在理论方法和阐释等诸多方面有所不同,了解这些差异对于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十分重要。特别在问题导向和理论阐释上,不了解两者之间的差异,往往会造成误导和混乱。特殊性研究关注具体、偶然和独特的问题,必然探讨谁(who)、何时(when)、何地(where)、何物(what)等具体的问题,而一般性研究主要关注重复或平行发生事件(如农业和社会复杂化过程),这类研究对于具体的人群、物品、时间和地点不是太在意,而是关注相同过程背后的因果律,可以归结为何何(why)和怎样(how)等问题。在研究方法上,特殊性研究采用归纳法,就是充分收集材料和事实,在材料充分积累的基础上取得对具体问题的认识并做出解释。而一般性研究探讨的是现象背后的潜因,所以无法用归纳法做到,必须采用演绎法的逻辑推理和实证研究,就是先对可能的原因提出假设或构建解释的模型,然后寻找材料来予以证实。

二、一般性问题

一般性研究又称通则(generalization)研究,常见于自然科学领域,意在探究那些重复发生现象背后的潜因和规律。而特殊性探究多见于历史学和人文科学领域,主要侧重那些偶然、孤立和非重复发生的独特事件。虽然一般性研究与特殊性研究是自然科学和历史学及人文科学的区别所在,但是自18世纪以来,西方的社会人文学科也产生了探究社会规律的一般性视角。其早期代表为亨利·摩尔根、爱德华·泰勒、马克思和恩格斯,20世纪上半叶和中叶为戈登·柴尔德、莱斯利·怀特和朱利安·斯图尔特,下半叶为马歇尔·萨林斯、埃尔曼·塞维斯以及路易斯·宾福德等欧美诸多过程考古学家。这些学者都采用进化论模式,设法构建人类社会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一般性发展轨迹。由于通则或规律性研究是高层次的理论阐释,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是相通的,因此彼此采用的术语、概

念和阐释方式都基本相同。而这正是为何美国过程考古学将通则性研究看作是最具成就感的目标,因为它能为整个社会学科作贡献。

摩尔根是早期进化论的代表,他从直线进化的视角来探究人类社会的一般性趋势和普遍规律,提出了著名的三阶段文化进化模式,这就是蒙昧、野蛮和文明。他还强调,没有一种文化可以不经过程所有的低级阶段而达到高级阶段。^②摩尔根的社会进化研究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赞赏,并试图加以完善,对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趋势做出整体解释。泰勒被誉为人类学之父,他主要关注人类知识与信仰系统的进化。摩尔根和泰勒都将社会文化的进化看作是自然界万物进化规则的组成部分。

柴尔德是文化历史考古学的鼻祖,20世纪上半叶他为构建考古学文化概念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考古学方法论带来了一场变革。他同时还被誉为考古学一般性解释的先驱。柴尔德充分利用当时欧洲与近东考古材料的积累,采用摩尔根的二阶段进化模式来构建和解释这些地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性趋势。这种社会进化论阐释见于他两本通俗性著作《人类创造了自身》和《历史发生了什么》之中。比如,他用蒙昧、野蛮和文明概念分别指称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并提出了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的概念。起初,他求助于技术因素来解释文化变迁的动因,后来他转向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来解释美索不达米亚城邦国家与古埃及神权君主国家之间的区别。^③柴尔德以其出色的材料整合能力和敏锐的抽象理论思维,被誉为罕见的伟大综述者。

20世纪中叶,美国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以摩尔根的继任者自许,以一般性视角来解释社会文化的变迁。他将文化定义为热动力系统,而该系统的发展受制于技术与能量,如果所有条件均等,那么文化会以能力投入的增加而发展。怀特用文化=能量×技术这一公式来表述这一模型。^④朱利安·斯图尔特则以多线演进的模型来构建不同社会文化的一般性发展趋势,并提出了文化生态学作为解释文化变迁的理论。受功能论的影响,他视文化为环境适应的手段,因

此文化演变的原因可以从生态环境找到答案。^⑤在怀特和斯图尔特的影响下,萨林斯和塞维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新进化论的概念,用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这四阶段进化类型,建立起一套与摩尔根文化进化论有别的新进化论模型。^⑥斯图尔特的文化生态学理论和萨林斯及塞维斯的新进化论为美国新考古学所继承和发扬光大,宾福德将构建社会发展规律或文化进程看作是考古学研究最主要的目标。虽然其纲领过于偏执,但是考古学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努力在过程考古学阶段达到了鼎盛时期。

由于一般性研究探索事件或社会变迁的普遍规律,其采用的概念、术语和解释与特殊性研究十分不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采用高度抽象的概念、采用严格科学定义的术语,而对问题的解释往往具有普遍的意义和规律性的价值。一般性讨论的抽象概念和术语与具体事实关系不大,这种规律探索被视为“科学”研究,它意在确定事实和现象的前因后果,揭示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因此表述的抽象性是一般性研究的显著特点。^⑦

为了了解社会文化变迁的动因和发展规律,一般性研究往往会以决定论方式提出社会发展的“主动动力”或“主因”,并构建其潜在因果关系的解释模型。解释社会发展动因的模型包括马克思的阶级冲突论、怀特的技术决定论、斯图尔特的环境决定论、博塞洛普的人口决定论等,解释文明与国家起源的模型包括柴尔德的自发论、魏特夫的水源论、卡内罗的战争论和弗兰纳利的生态多元论等。而这类解释模型往往成为考古研究努力检验或证实的目标,这些模型往往强调不同的决定因素,并相互竞争或补充,以求能够合理解释考古和历史现象所见的文化与社会变迁。如果某模型的解释十分成功,那么这个模型就能上升到理论层面而成为通则,并具有普遍指导的意义。

20世纪中叶开始,美国的新进化论摒弃博厄斯的历史特殊论,倡导一般进化的模式来解释社会变迁的普遍规律。斯图尔特曾对构建社会进化模型有如下说明:(1)必须建立一种文化、形态和机构的类型学,诸类型代表了抽象化的概念,它们并不考虑独特性,而是

将共性分离出来进行比较;(2)诸类型的前后关联必须以纵向(累进)或横向(跨文化或跨地域)或以两者兼有的方式加以确定;(3)将文化现象纵向和横向关系平行的重复发生予以公式化,便是对因果、法则和规律的科学陈述。^⑧由此可见,摩尔根所谓蒙昧、野蛮和文明的文化进化论、马克思主义所谓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进化论、萨林斯和塞维斯的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的新进化论,以及弗里德的平等社会、等级社会、阶层社会和阶级社会的政治进化论^⑨,都属于这种社会直线进化模型的构建,是一般性研究的重要标志。由于一般性研究在人类学和考古学上是相通的,所以欧美考古学的阐释理论大都来自文化人类学的进展。

中国考古学也并非全无一般性研究的视角,夏鼐曾经指出:“作为一门历史科学,考古学的研究不应限于对古代遗存、遗物的描述和分类,也不应限于鉴定遗迹、遗物的年代和判明它们的用途与制造方法。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⑩但是,我国考古学的这种规律性说明仅满足于将19世纪摩尔根和马恩进化论术语当作社会标签来使用。有鉴于此,我国学者应当熟悉当代国际一般性研究的概念和方法,否则中国的考古研究不只无法跻身世界学术之林,而且还有沦为国际笑柄之虞。

三、特殊性研究

特殊性研究一般关注具体、偶发和独特的事件和问题,最典型的就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的历史重建,它是在19世纪进化考古学的式微之后发展起来的。在人类学领域,19世纪摩尔根和泰勒的早期进化论后来饱受诟病,被认为过于演绎推理,太过于一般化和理论化,对历史事实和民族志材料不够重视。^⑪于是,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社会人类学界占据主导地位是博厄斯学派的历史特殊论。而当时柴尔德、怀特和斯图尔特等人的一般性探究几乎是逆流而行,孤军

作战。弗朗兹·博厄斯反对进化概念,反对摩尔根的文化进化论,强调每一种文化都是一种独特的实体,必须将它们从本身来了解和评估。博厄斯将社会文化演变看作是一种偶然的过程,由传播、传统行事方式出错以及对既有思想的偶然重组所引发。^⑫当博厄斯学派处于鼎盛阶段时,其研究导向趋于忽视理论概括,强调事实比理论更重要。当时博厄斯派学者流行一种看法,认为资料收集工作可以脱离理论指导来进行,一旦有了足够的资料,就可能得出清楚的理论解释。总的来说,博厄斯学派否认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普遍规律,反对社会进化学说。^⑬而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学领域里,则由兰克学派主导着国际的史学潮流。里奥波德·冯·兰克的史学观也很接近特殊论,认为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要说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如要了解历史真相,只有研究原始材料这一条路。兰克认为,收集基本材料和确立过去的事实是研究的第一要务,而对材料的阐释不过是个人的主观见解而已。这种客观主义是兰克学派的主要特征,他们提倡秉笔直书,用材料说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通过史料来重新历史。

特殊性研究大体是从具体现象追溯其直接的原因,而非探究长时段的规律,有的研究报告甚至仅限于表象的描述和罗列,像是一份出土材料的清单,没有任何的问题意识。这样的研究对于我们了解过去毫无贡献。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范式普遍流行传播论解释,偏好从考古学文化的器物类型比较来说明它们的关系,将它们说成是文化传播、交融、人群迁徙的结果。对文化变迁的深层原因往往无能为力,或只能用“碰撞”“断裂”等词汇来做些不着边际的说明。而对于历史阶段的考古学解释,很大程度要直接依赖文献记载。

特殊性研究因为是针对特定现象和偶发事件,所以在解释上非常具体,比如指认某些遗存属于某人群、某种工具或某个时代等。这种解释与一般性研究的抽象特点迥异,因而常被说成是“常识性”或“历史的”说明。我国考古学一直被视为历史学的分支,因此基本上流行的是特殊性研究,偏好常识性和历史学的说明,对西方人类考古学采用抽象术语和解释模式构建十分陌生。历史学说明虽无不当,

但由于诸多术语源自文献和个人杜撰,缺乏科学定义,因此往往因人而异,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比如,酋邦概念引入中国后引起了不小争论,有人认为它不适用于中国,因为它无法与我国的考古发现对号入座,有人则认为中国史前不存在酋邦社会,于是中国学界不少人还是偏好用“古国”这一术语来指称前国家的复杂社会。酋邦术语在中国的水土不服,究其原因,一是对考古研究一般性视角和特殊性视角认知上的缺陷,二是诚如保罗·巴恩所言^⑩,学者对采用别人发明的术语总心存芥蒂,就好像使用别人的牙刷那样别扭。

20 世纪上半叶,由于考古学与人类学和历史学关系密切(旧石器时代考古仍与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有密切的联系),因此这两门学科对考古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影响很大。比如,考古学在引入中国后明显受到傅斯年治学方法的影响。傅斯年留学英德七年,深受兰克学派的影响。他以中国的兰克学派自许,确立了以史科学为中心的治学方针,提出“史学便是史科学”^⑪的口号。这种治学方法在我国考古学中至今仍明显可见,这就是重材料而轻理论,提倡充分公布考古材料,让材料自己说话。

四、考古学解释

伦福儒和巴恩指出,对于今天的考古学家,一项最具挑战性的任务是要知道如何以人的方式来解释物质文化。^⑫科学哲学家内格尔指出,科学工作与众不同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可靠和可信的系统解释,而解释就是对“为什么”问题的说明。^⑬在一篇有关考古学解释的专论中,伦福儒说,解释的目的就是要“把问题讲清楚”^⑭。

在欧美考古学中,对考古学解释的重视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随着新考古学强调理论和科学方法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之前这段时期被伦福儒称为考古学解释漫长的酝酿期和休眠期。因此,在 20 世纪初科学考古学引入中国时,当时的学科范式并不强调解释的必要。当时全世界的考古学家集中精力用类型学和地层学来构建出土材料

的年代学,无暇顾及对物质文化各种问题的解释。20世纪40年代末放射性碳测年技术的发明,将考古学家从繁重的年代学工作中解放出来,去关注其他更重要的问题,包括材料的信息提炼和解释。

然而,要为考古材料提供科学的解释又谈何容易。这涉及整个考古调查、发掘、采样和分析全过程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包括问题指导、研究设计、出土材料数量和质量的控制、周全的分析方法的以及充分和准确的信息提炼。如果没有一套合理的科学操作程序,仍然采取那种见什么挖什么、缺乏问题导向或毫无目的的发掘,那么即使想要对出土材料做一番科学解释也是不可能的。

伦福儒将考古学研究分为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一是问题、观念和理论;二是研究方法和技术;三是田野考古发现(见图1)。这为考古研究确立了一种严谨和科学的操作程序。有了理论和问题的指导,采用哪种方法以及创造新方法就有了明确目标,而且田野发掘也对寻求和收集的材料有了明确的选择和要求。如果严格按照这套程序进行操作,那么考古研究就能按步骤从材料中提炼各种必要的信息,从而解决事先设定的问题。一旦问题有了答案,那么考古学家就能做出科学的结论和合理的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考古发掘是为解决各种问题而进行采集证据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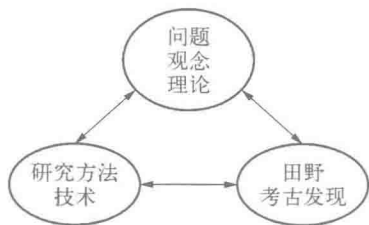


图1 伦福儒考古学研究三方面

由于考古学研究有各种不同层次的问题,解释是对提出问题的说明,所以解释也要求以问题的特点、深浅和层次而异。比如对于谁、何物、何时、何地等特殊性问题,答案相对比较容易获得,用相对或直接断代就能对年代学问题获得比较可信的答案。但是,对于为何及如何,以及有关社会文化变迁如农业和文明起源等一般性问题,解释的难度就比较大。而对于当代考古学家的重大挑战,主要是对后一类问题提出合理和可信的解释。

就当下考古学对社会文化变迁习见的解释方式而言,总体上可以分为传播论解释、过程论解释和后过程论解释几类,下面略予以分析。

1. 传播论解释

传播论解释是文化历史考古学习见的解释方式,这与其编年史学的研究范式不无关系,即关注文化发展的源流,或寻找相关的线索来全面追溯他们祖先。在我国的考古报告中讨论的问题基本都是关注文化关系及其他的来龙去脉,考古学文化被看作是史前社会群体或族属的物质表现,于是考古学家专注于从不同区域的考古发现中寻找彼此相似的器物,以追溯文化传播和发展的脉络。而这种脉络的编年就被等同于文化发展史。然而,这种解释的前提,现在被认为是靠不住的。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将类型学建构的文化单位与历史事实(如族属)混为一谈,即认为考古学家辨认和构建的史前人类生活单位和他们学科的分析单位是一码事。其危险在于将历史事实等同于一种类型学构建。这很容易将用类型学通过漠视差异而获得的共性,与某些史前社会的共性混为一谈。^{①9}

还有,学者们在利用传播论来进行解释时,常常并不考虑文化独立发明或趋同的可能。有些物质文化由于其适应或使用功能的原因,可以被不同人群或没有历史关系的文化所独立发明,比如打制石器、磨光石器和许多武器如矛头和箭镞,由于其原料可塑性很小、加工方法有限、用途特殊,其产品的趋同可能极大。因此,布鲁斯·特里格指出,如要证实文化之间的历史关系,必须首先要排除被比较器物是趋同发展的可能。^{②0}

最后,传播和迁移在过去确实发生过,但是能从考古学上予以论证和说明的机会很少。在本书第9章中有个图例,有两个小岛起初的物质文化完全不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化的交往,两个岛屿的文化相互影响,最后变得完全相同。这在考古学文化上自然被看成同一文化。这说明了一个问题,这就是考古学文化概念只适合研究新石器早期相对封闭和孤立的农业社会,当社会复杂化进程发展,